

《史記》先秦部份使用的其中幾部書籍概況

《漢書》卷六二〈司馬遷傳·贊〉說：「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《春秋》，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，以為之傳，又纂異同為《國語》；又有《世本》，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、王、公、侯、卿、大夫祖世所出；春秋之後，七國並爭，秦兼諸侯，有《戰國策》；漢興，伐秦，定天下，有《楚漢春秋》，故司馬遷據《左氏》、《國語》，采《世本》、《戰國策》，述《楚漢春秋》，接其後事，訖於大【天】漢。」《楚漢春秋》乃西漢初陸賈所撰。據《漢書》卷三十〈藝文志·六藝略·春秋類〉的著錄，共九篇。宋以後亡佚。然而一則因為陸賈卒於西漢文帝年間，記載的歷史有限，再則這段時期的歷史狀況有更完備的《史》、《漢》可依據，所以雖然還有少許的殘章散句被古書稱引，但無甚價值，可置不論。清人茆泮林有輯本。

《世本》

「世」相當於後世所說的族譜。

《周禮》卷二六〈春官·小史〉：「掌邦國之志，奠（改讀為定）繫世，辨昭穆」。只有正確的「世」，在人際倫輩上才會有序，確立繼承資格先後；在祭祀時，才能使得祭祀對象及相應的祭儀、祭品合乎禮制，不會得罪祖先。此所以《國語》卷四〈魯語上〉說：「夫祀，昭孝也……故工、史書世；宗、祝書昭穆，猶恐其踰也」。既然在古人心目中這般重要，所以《國語》卷十七〈楚語上〉申叔時論及太子等貴族教育時，其中一項就是「教之世」。

大小貴族大概都有各自的「世」，而且可推想：這些「世」還會有副本藏在周室，以備一旦出現爭執狀況，可以稽核。在某國、某家沒徹底敗亡之前，它的「世」勢必要不斷地增修。大概在漢初，有人將蒐集到的各國、各家累積下來的「世」，彙編成一本書，題名為《世本》。《漢書》卷三十〈藝文志·六藝略·春秋類〉著錄的，共十五篇。其內容至少包括〈帝系〉、〈王侯譜〉、〈卿大夫譜〉、〈記〉、〈世家〉、〈傳〉、〈氏姓〉、〈居〉（這些國、家的所在地點）、〈作〉（文物的發明者）、〈謚法〉等。近年清華簡中有篇從未見過的作品，從相傳中殷商時期的楚國祖先季連，一直記載到戰國初楚悼王時的所居之處，因此整理者將之題名為〈楚居〉。這篇很可能就是《世本》中〈居〉這部分有關楚的紀錄。由這篇作品才得知：只要是楚君所在的都城，就叫做「郢」，「郢」並非如以往所說的某一固定地點。

前引《漢書》說這本書的內容止於「春秋」，可是劉宋裴駟替《史記》卷四三〈趙世家〉作《集解》時，曾稱引《世本》：「（趙）孝成王丹生襄王偃；偃生今王遷」，既說「今王」，可知：《世本》涉及的內容已晚至秦國統一天下的前夕了，班氏認為《世本》下限為「春秋時」，明顯不當，當按照劉知幾《史通》卷十二〈外篇·古今正史〉所說，此書「終乎秦末」。因為在唐代避太宗李世民的名諱，所以在古書中又常可見將此書改稱為《系本》。

東漢鄭玄弟子宋均、曹魏王肅的師傅之一宋衷（古書中或作「忠」）都曾為《世本》作註。

這本書大概在宋代已經散佚了。宋初編撰的《太平御覽》固然稱引了不少，但《太平御覽》往往只是根據以前的類書轉引，並非根據當時真能見到的書籍摘錄，因此不能以此推斷宋初還有《世本》的完本。

由於這本書內容根據的都是先秦各國、各家歷代史官的記載，雖然難免摻雜一些傳說，流傳過程中又會有不少訛誤，但大體而言，極其可靠。試看《史記》卷三〈殷本紀〉依據《世本》所撰的商朝先王名號、世系，對照出土甲骨卜辭中絕對可靠的紀錄，前者的正確度居然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，由此可見一斑。近年清華簡中的〈楚居〉就解答了不少以往的困惑。好比：楚為何又稱為荊、楚國的先祖為何會在殷、周鼎革之際參與其間、楚靈王為何會說他祖先「舊許是宅」。既然《世本》的片言隻語都可以對茫昧的上古狀況提供些線索，所以許多清代學者花工夫輯佚。今日所知至少有王謨、孫馮翼、陳其榮、秦家謨、張澍、雷學淇、茆泮林、王梓材八家輯本。其中以茆、雷二家輯本為佳。秦嘉謨的《世本輯補》雖然最流行，易於尋得，但錯誤頗多，好比：因為古書多無標點，秦氏會將引述者自己的按語也誤認為是《世本》原文。

《國語》

《毛詩》卷十七之十三〈大雅·生民之什·公劉〉毛《傳》：「論難曰語」；《周禮》卷二二〈春官·宗伯·大司樂〉鄭《注》：「答述曰語」，可見：從嚴格意義來說，「語」假設的情境應該是一人以上參與的意見表述。

貴族們討論政治、宗教、禮儀等方面事務時，必然都會有「語」。《漢書》卷三十〈藝文志·六藝略·春秋類·敘論〉說：「左史記言；右史記事」；《禮記》卷二九〈玉藻〉則說：「動，則左史書之；言，則右史書之」。按：記載言論，不可能全然不以某一事件為背景；敘事時，事件中的人物不可能始終都無對話，所以「記言」、「記事」都只是就記載著重點而論，至於史官中如何分工，由誰記載那一方面的，不得而詳，但貴族間的這些討論會被擇要記錄下來，作為後世的參考，蓋無可疑。無怪乎申叔時論及太子等貴族教育時，其中一項就是「教之語，使明其德，而知先王之務」。將某些國累積流傳下來的語，按國別，編撰在一起，即成了某種「國語」。此所以劉熙《釋名》卷二十〈釋典藝〉會說：「《國語》記諸國君臣相與言語謀議之得失也」。

因為《史記》卷一三十〈太史公自序〉曾說：「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國語》」，加以《左》、《國》的內容有許多相重，所以傳統認為《國語》是左丘明撰寫《左傳》時，附帶編撰的。此說當然不對。從這本書的下限已經到越滅吳、智伯被滅了，可知：當是戰國時期的成品。這本書共二十一篇，〈魯語〉、〈楚語〉、〈越語〉僅二篇；〈齊語〉、〈鄭語〉、〈吳語〉均僅一篇，〈晉語〉則佔九篇，因此學界多推想：此書當出諸三晉人之手。按：這種推想待斟酌，因為晉國乃當時最重要的國

家，發生的事，以及因此出現的議論格外多。至於西漢人已將此書視為《春秋外傳》（見《漢書》卷二一下〈律歷志〉、卷七三〈韋賢傳附子玄成傳〉），更屬不當，且不說〈周語上〉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西周時期的「語」，超過上限始於東周初年（東周平王四十九年，即魯隱公元年）的《春秋》的範圍，申叔時論太子等貴族教育時，「教之春秋」與「教之語」是並列的，可見：兩者性質截然有別。

從西晉武帝咸寧五年（279）至太康二年（281）間汲冢出土的書籍中有「《國語》三篇，論楚、晉事」；1987年5、6月湖南省慈利縣石板村戰國中期楚墓出土的文物有《國語·吳語》，可知：《國語》一定是戰國中葉的作品，絕非如某些人妄疑乃西漢末人偽造。

《國語》確實保存了相當多上古的史料、觀念，像西周厲王禁止民謗、褒姒的出身、鄭國在西周覆亡前夕如何圖謀自保等等，都有賴此書的記載。然而既然是戰國年間的人編撰的，也就無可避免摻雜當時人的觀念，甚至有些錯誤的傳聞，所以使用其中的材料時，當謹慎辨析。

東漢已降，大概因為《左傳》的地位漸升，這本號稱《春秋外傳》的《國語》也連帶開始被重視，於是有些學者為之注解。今日流傳下來的僅有孫吳韋昭的《國語解》。在他之前的鄭眾、賈逵、王肅，與他同時的虞翻、唐固，在他之後的孔晁，他們的注解若非全亡，就是因為韋昭的注解中曾經稱引，才得以殘存。這種現象也無形反映了韋昭注解的高明，故獨能經得起時間考驗，而存於天壤間。

在歷史流傳中，這本書出現許多訛誤。乾、嘉學者黃丕烈（字蕘圃）得到北宋仁宗明道二年的刊本，校勘後，付梓，是當前最佳的本子。世俗多用近人徐元誥的《國語集解》，此書雖然網羅前賢對該書字詞的研究，但有不少錯誤，並不適合初學者使用。

附帶一提，雖然「語」本來是貴族們磋商事務言論的擇要記錄，但隨著上古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狀況的巨變，文化教育的對象也下移，以致在野士人教學的方式也仿用了這種形式。《論語》即其著例。真正的《孔子家語》（一般認為：今本《孔子家語》乃王肅所撰）大概也是這類。

《戰國策》

戰國時期，遊說之風盛行，遊說之士需要一定的例案以供揣摩學習，於是將有關資料彙編應時而興，據劉向〈戰國策敘錄〉，當時他在中祕所見到的這類彙編甚多，「或曰《國策》，或曰《國事》，或曰《短長》，或曰《事語》，或曰《長書》，或曰《修書》」（一般認為：《修書》可能是淮南王劉安所藏本，因為其父厲王名長，故避諱，改為「修」）。劉向認為：既然內容涉及的時代限斷「繼春秋以後，訖楚、漢之起」，乃「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，為之策謀」，所以在按照國別（七雄加上東周、西周、宋、衛、中山，共十二國）歸納整理後，定名為《戰國策》。共三十三篇。

既然《國策》等編本是在那樣的背景、動機下出現，不少具體情境、事件乃虛擬的；非虛擬的部份也不強調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的精確度，只要能達到「假

設碰到這樣的狀況，該如何措辭」的範本作用即可，所以它們應該隸屬於縱橫家，而不當如《漢書·藝文志》歸在〈六藝略·春秋類〉之下。南宋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就將它歸諸縱橫家類。近年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一批帛書中，有與《戰國策》性質極相近的二十七篇作品（十一篇見於今本《戰國策》及《史記》），整理者將之定名為《戰國縱橫家書》，當基於同樣理由。

《史記》卷十五〈六國年表·序論〉說：「秦既得意，燒天下《詩》、《書》，諸侯史記尤甚，為其有所刺譏也」，「獨有秦記，又不載日月，其文略不具」，這才迫使司馬遷不得不擷用《國策》等編本中的材料，以填補嚴重空白。此所以《史記》戰國部份的事蹟、年份錯誤百出。近代學者依據《竹書紀年》的斷簡殘句，這才使得戰國中葉以前某些世系、年份得以多少恢復實際概況。然而因為《竹書紀年》的記載止於魏襄王，所以戰國中葉以後的事蹟，還有賴《戰國縱橫家書》、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《大事記》等提供一些助力。

東漢高誘首先替《戰國策》作註。

北宋初葉，《戰國策》已殘缺十一篇，而且謬誤甚多，曾鞏「訪之士大夫家，始盡得其書，正其謬誤」，所以今本《戰國策》乃重編本，非劉向所編原貌，故北宋以前古書中稱引的某些《戰國策》文字不見於今本。例如為智伯報仇未果的豫讓死前，「願請君（趙襄子）之衣而擊之」，從《史記》卷八六〈刺客列傳〉司馬貞的《索隱》，得悉：原來有「衣盡出血，襄子迴車，車輪未周而亡」的戲劇性結尾，今本則無。

北宋初葉，不僅《戰國策》本文已殘缺，高誘注殘缺的更嚴重，僅剩十篇。曾鞏只盡量恢復前者，並未過問後者；縱使是前者，也仍然有許多謬誤。南宋姚宏為之校正，並且將殘餘的高誘註附入，進一步作註。為了與高誘舊註分別起見，他將自己的註解標以「續」。由於姚宏的校注未流行，同時期未見其書的鮑彪也替《戰國策》作註，但每以《史記》等他書為據，改動原文，反增謬誤，導致元朝吳師道「因鮑注，正以姚本，參之諸書，而質之（呂祖謙）《大事記》，存其是而正其非」。吳師道為了眉目清楚，凡於鮑註外所增者，標以「補曰」；糾正鮑註者，標以「正曰」。清人黃丕烈根據宋刊姚宏注本，加以校勘，付梓，最可信用。

附帶一提，東晉孔衍對於「記言」這種文類甚感興趣，據《隋書》卷三三〈經籍志·史·雜史〉、《舊唐書》卷四六〈經籍志·乙部史錄·雜史〉的著錄，他先後編撰了《漢尚書》十卷、《後漢尚書》六卷、《魏尚書》十卷。《史通》卷一〈內篇·六家·國語家〉說：「孔衍又以《戰國策》所書未為盡善，乃引太史公所記，參其異同，刪彼二家，聚為一錄，號為《春秋後語》。除二周及宋、衛、中山，其所留者七國而已」，「為十卷」。由於孔衍當時見到的是劉向舊編，所以《春秋後語》中與今本《戰國策》相應的部份，其文字多少可作為校正今本《戰國策》的依據。吳師道就已經如此利用了。宋之後，這本書亡佚。敦煌石室有其殘章剩句。今人王恆傑《春秋後語輯考》最便參用。